

文学偶像办杂志：

青春文学我做主

浩 杰

2011年3月9日,《大方》“落落大方”地上市了,主编安妮宝贝,近90页村上春树访谈,杂志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是争议点。这本Mook(杂志书, Magazine和Book的组合)甫一露面,就已登上畅销书榜顶端,与张悦然同类的杂志《鲤》、郭敬明旗下的《最小说》、《文艺风赏》、《文艺风象》,韩寒发行的百万的《独唱团》形成辉映之势。至此,青春文学偶像们办杂志已蔚然成风,他们不再满足单纯做写手,而愿意尝试更有挑战性的出版人甚至商人角色,这是否意味着青春文学又一次华丽转身?

形式的美感 VS 内容的力量

这些青春读物,给人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与《收获》、《人民文学》等容颜不变的传统纯文学刊物相比,它们更看重图创意、艺术美感,并勇于进行新形式的尝试。

《大方》大气地打破了杂志的这种狭隘格局,创刊号就用大幅笔墨刊登了村上春树的深度访谈,又挖掘出周作人的未发稿《龙是什么》,开风气之先;安妮宝贝亲自操刀撰写长篇随笔,以吸引眼球;还用贾樟柯的散文,香港作家黄碧云首次在大陆发表的小说,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伊丽沙白·斯特鲁普的代表作《药店》,重磅压轴。这样豪华的阵容,确实有底气“大方”一下。

另一本同样文艺气息浓厚的Mook杂志《鲤》于2008年6月出炉,主编张悦然。这也是一本注重文字诗意的杂志,用李商隐诗句“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鲤”字为刊名,已透露出编者的文艺偏好。它“面貌新颖,和传统文学杂志相比,有一种时尚、女性气息”。

在商业上获得更大成功的毫无疑问是郭敬明,继《最小说》、《最漫画》大卖之后,郭敬明一路高歌猛进,又在去年底推出了两本杂志——笛安任主编的《文艺风赏》和落落任主编的《文艺风象》。两本杂志都有着浓重的日本情结,带来新风。

文学理想 VS 商业追求

这些青春文学杂志的主办者,都是以写作起家的,办刊是他们文学理想的延伸,亦是商业潮流大势所趋。

安妮宝贝原名励婕,1974年生于浙江宁波,痴迷文字,1998年,她在网络BBS上发表了名为《告别薇安》的短篇小说,从此走红,成为小资、破碎、忧郁、文艺叙述风格的代表。在过去的十年,她很少抛头露面,直到担任《大方》主编,才走出神秘纱幕。

同样是女作家,张悦然是抱着寻找同道的理想来办《鲤》的。在新加坡留学期间,异国他乡,张悦然多少有些寂寥,在强烈的写作诉求中,上文学论坛成为她的“精神支柱”。将自己新写的得意小说贴到论坛上,看看有没有回复,是鲜花还是板砖。就是那段孤独的时光,让她下定决心日后办一本属于自己的同人文学刊物,于是当她遇到同样热爱文艺的周嘉宁,《鲤》便应运而生。

而郭敬明办杂志却毫不避讳商业化,他说:“我在作为一个作家的同时,我还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优秀的杂志主编。”身为上海最世文化发展公司的董事长,他深谙青春小说的商业运作。而他的《最小说》,自2006年创刊以来,一直以50万份的发行量笑傲江湖,通过这本杂志,郭敬明以签约作家的方式捧红了一大批年轻作家:笛安、落落、七堇

年、苏小懒、消失宾妮等。

不过,在所有青春作家创办的杂志中,无法绕过的高峰却是韩寒的《独唱团》。论收入,韩寒远不如郭敬明挣得多,但作为一个意见领袖对青年的影响,看《独唱团》显然比看《最小说》有范儿得多。2010年7月6日,《独唱团》首发——一首印50万册在两天内被经销商一抢而空,后加印的100万册,也全部售空。但这本杂志很快遭遇猝死,从诞生到结束不足六个月。2010年12月28日,韩寒发表博文《后会无期》,宣告《独唱团》终结,“我们的遗憾是作为一本准备时间足够充分的文艺读物,第一期做得不够好,不幸让大家给看见了,第二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幸大家都没能看见”。

青春文学 VS 传统文学

追根溯源,这批文学偶像中最重要的几个都发迹于老牌青春文学杂志《萌芽》,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皆是通过新概念作文而改变了命运。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文坛的格局,以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朝气撞击着传统文学。只是当年青春的“80后”转眼就到了30岁关口,青春饭不能吃一辈子,于是他们纷纷转型,有的办杂志,有的涉足出版,利用积攒下来的人气和影响力再战江湖。

有人追问:青春文学作家办杂志是好事还是坏事?中国新一代文学杂志浪潮,除了滚滚的钱和产业化

的头脑,还能带来什么?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就对新杂志铺天盖地的营销不无担心,因为杂志不是图书,“考验的是一时的营销策略,还有综合能力”,而且“文学杂志不能靠照片、装帧和摆饰,说到底还是靠作品抓住读者”。不过,他对新杂志的争妍亦持宽容态度:“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它使我们的文学生态更为丰富更具差异性。在这个时代里,认真地丰富差异和尊重差异,使得文学变得摇曳多姿,那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摘自《青年文摘》

大师的“杰作”

曾有情

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舒伯特一生为人们留下了《G大调交响曲》、《未完成交响曲》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杰作。但这位音乐大师在没有成名时却贫困潦倒。

有一天,他的一位画家朋友马勒前去看他,在朋友面前,他闷闷不乐。马勒问其原因,舒伯特无奈地说:“糟透了,我已穷得连买乐谱纸

的钱都没有了,一肚子的音乐没了载体,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样。”马勒听了和他一样心酸,因为自己的腰包也空空荡荡。但马勒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兴奋地说:“别着急,我有办法。”

他迅速打开自己的画夹,从里面取出画纸,架好尺子,一丝不苟地画出道道线条,五条一组,他画了一

条又一条,画了一张又一张,画了整整一天,厚厚一叠乐谱纸经过画家的手便制造出来。舒伯特万分感动,饱含激情地在马勒画出的五线谱上,行走他精灵般的音符,创作出了好几首佳作,其中就有他的传世之作。他感慨地说:“这是画家和音乐家共同心血的结晶。”

多年后,马勒成了著名的油画大师。有一次,学生问他:“您一生中对自己的哪幅作品最满意?”

马勒想了想,十分认真地说:“我最满意的作品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舒伯特画的乐谱线。”

摘自《思维与智慧》

芬兰官民难分清

李树荣

前几年,一个芬兰IT精英开车超速,被警察开了约60万欧元的天价罚单,这个价码差不多可以买下他那部车。原来,芬兰的交通法规定,罚款是按肇事者的收入比例开出的,因为同样罚1000元,富人可能不在乎,穷人却会很痛苦,而事故是一样的,没理由让富人和穷人的痛苦程度不同。把平等做到这个份上,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为考察芬兰的廉洁程度,曾与芬兰警方合作进行了一个试验。俄方派出记者在芬兰的路上故意超速,被警察抓住后记者暗地掏出1000欧元,芬兰警察脸色大变……接下来的对话是在警察局进行的。记者告知原委后,警察向他道歉,并说:“您真的以为我会收钱吗?我不是白痴,拿自己的工作冒险……”此后一个星期,该记者在芬兰多个城市“作案”,

但结果颇令人“泄气”:他碰不到一个接受贿赂的警察。一位资深警官告诉记者,自打他当年进警察局上班起,就没有看见过任何贿赂发生。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前几年芬兰监察部门别出心裁地搞了个高科技的公务用车监控系统,跟踪是否有人开公车办私事,结果系统装了几年,没抓到过一个违规者——不是系统不灵,而是公务员太守规矩了。而芬兰的总统反而“不守规矩”,前总统阿赫蒂萨里曾自己拖着行李在机场与普通民众一起排队通关;另一前总统哈洛宁也不顾身份,在超市打折时常挤在人群中抢购便宜货……芬兰已平等得让人分不清官和民了,干净得快让人忘记世间还有腐败这回事了。

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建议:欧洲领导人应暂时放下所有事情,“去芬兰的学校上课”。除

了平等和廉洁,芬兰的教育成就也闻名世界。芬兰年轻人最想做职业不是公务员和医生、律师,而是中小学教师。在芬兰,中小学教师受尊重的程度超过了总统和教授,师范学校招生时总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录取率只有10%……

芬兰令人惊讶的地方还不止于此:芬兰人平均每人每年向图书馆借17本书,并定期将流动图书馆开到边远的北极圈;在我们的一些中学生或忙赶时髦或为课业所苦时,四成芬兰的中学生却“老土”得把阅读当作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

有些国家的税率表面上不高,但人民的“税收痛苦指数”却很高。芬兰则相反,为应付一系列福利开支,税率之高在全世界是有名的,但芬兰的纳税人基本上能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交上去的钱一点都没有“跑、冒、滴、漏”,政府为使每个人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已尽了力,而为了国家的未来,即便只是为了自己和孩子的明天,投资教育和医疗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

摘自《学习博览》

日本中产阶级何以强大

刘 迪

人们常说东京“居大不易”,物价房价贵、食物贵,但是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舆论对日本“高物价”看法逐渐改变。

首先,以最低生活水准来说,日本的物价体系,可以满足低收入者的生存需求。日本一般4口之家的饮食开支约为3万日元。一般来说,东京散工工资每小时1000日元,一天以7小时计,可收入7000日元。关于第二个尺度,主要是指基本生存

外的“发展”问题。比如子女学费、进修充电、海外旅行、家庭休假等。

以笔者看,日本的物价体系,其实设计得比较巧妙。日本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家庭,如要满足前者,十分轻松;如要满足后者,只要精打细算,也可如愿以偿。这就是说,只要勤勉加上精打细算,你可在日本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生活。

战后日本通过一代人,建成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社会。分析其因

素,教育、文化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的教育,逐渐摆脱精英教育束缚。一个人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基本目标被设定为成为“社会的一员”,“为社会做贡献”。战后高速增长时代,众多公立、私立大学诞生,现在几乎所有日本适龄男女,只要想读,都可找到一家大学。日本教育制度,保障了中产阶级的再生。

另外,每逢竞选,各政党无不竭力讨好中产阶级,各个政党懂得,只有采取中道路线,争取最广泛的中产阶级支持,才能执政。而一旦执政,该党必须维系中产阶级利益,否则就会被清除。

摘自《中外文摘》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 zzwrbw1616@sina.com

洛克菲勒的四季

张宏涛

16岁那年,在离高中毕业只剩下两周时,因为贫穷,他不得不离开校园,开始在社会上闯荡。43岁时,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美国首富,建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他,就是世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

事业达到高峰时,洛克菲勒的身体垮了。一天,他突然晕倒。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多种慢性病,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气血两虚,濒临油尽灯枯。医生表示无药可救,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洛克菲勒也活不过48岁。

一夜之间,洛克菲勒就白了很多头发。

面对疾病,他无能为力。其实,洛克菲勒早有预感。他每天都在极度劳累中度过,工作起来,常常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有时甚至会两天两夜不睡觉。在别人看来,他总是充满激情和力量,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太累了,该休息了。

尽管如此,洛克菲勒并不悲观。毕竟,他的生理理想基本实现。剩下的日子,他开始培养接班人。

一天,洛克菲勒去非洲考察。路上,车陷入泥坑中。他和导游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庄,去找人帮忙。这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那里的人都在休息。洛克菲勒向众人表示,只要他们

能帮忙把车弄出来,就给他们很多钱。没想到,那些人拒绝了。他们说,现在是冬天,他们不要钱。

洛克菲勒不明白冬天和钱有什么关系。导游详细地讲解起来:

这里的人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他们认为,既然庄稼是春种、夏耕、秋收、冬藏,人类也应该这样,春天要种庄稼,做好打猎的准备;夏天要维护庄稼,打猎;秋天开始收割庄稼,最后一次捕捉那些成熟的猎物;到了冬天,就不再出去干活了。他们留够冬天要吃的食物,剩下的全捐给那些年纪大的和因病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整个冬天,他们都如动物冬眠一样,待在家里不出去,最多只是和邻居说话。

洛克菲勒有些鄙夷地说:“难怪他们成了富人。要做富人,一定要努力。无论是春天还是冬天,都要辛勤工作。”导游将他的话翻译给当地居民听。他们鄙夷地看了洛克菲勒一眼,也认为他不值。他们觉得他为钱违背自然规律,放弃了很多体验人生的机会。他们的一生由很多个春夏秋冬组成,洛克菲勒的一生只有一个春夏秋冬。他们警告他,再不改变人生态度,恐怕连体验第二个春天的机会都没了。

洛克菲勒深受震撼。的确,他的

童年如同春天,他一直在课余时间做小工,赚小钱,是人生的预备阶段;青年时期是他的夏天,他起早贪黑,白手起家,创立了石油公司;中年就是他的秋天,他硕果累累,成了美国首富;现在,他就要进入冬天了吗?他还有机会看到第二个春天吗?

洛克菲勒想过第二个春天,想过很多多个春夏秋冬。回国后,他做出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每年至少捐出100万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去世前,他要捐出绝大部分遗产。此前,洛克菲勒可是著名的铁公鸡,从不捐一分钱,连朋友结婚,也只送很廉价的礼物。这次,他先给非洲一些地区捐了款,接着又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捐款,主要用于消灭文盲、普及教育和消灭疾病、保障医疗两方面。

当年冬天,洛克菲勒捐出100多万美元,赚钱的事情却很少做。不用再煞费苦心地想着如何赚钱,他睡得很香甜,身体奇迹般恢复健康。

第二年春天,洛克菲勒才开始开拓渠道赚钱。洛克菲勒把自己对于一年四季的感受郑重地传给儿和孙子。后来,他的儿和孙子也都成了著名的慈善家。去世前,洛克菲勒已经捐出95%的财产,只给儿留下两千多万美元。

原本被医生判定只能再活五年,洛克菲勒却活到了98岁。

而遵从了一年四个季节的规律,他的儿和孙子也分别活了87岁和95岁。

摘自《现代青年》

留下吧。”从此,齐白石与李可染结下不解之缘。

李可染对拜师一事非常重视,认为拜师仪式必须郑重其事,所以拖了一段时间。齐白石却等不及了,有一次,他问李可染:“你愿不愿拜师?”李可染忙说:“您早就是我的老师了。”齐白石会错了意,心情郁闷,不时地对身边的护士念叨:“李可染这个年轻人,他不会拜我做老师的,他的成就将来会很高。”

这话传到李可染耳中,他急忙去见齐老,解释原因。齐老心直口快,连声说:“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李可染茅塞顿开,当天在齐老三子齐子如陪同下执弟子礼。齐白石连忙站起,扶李可染起来,高兴之余,眼睛都有点湿润。

此后,李可染便正式成为齐白石的得意弟子,尽得齐大师艺术精髓。

摘自《思维与智慧》

李可染拜师

陈 勇

1946年,经徐悲鸿引荐,李可染见到了心仪已久的80多岁高龄的齐白石,表达了自己想拜师学教的心情。1947年春,李可染带了20张画第二次拜见齐白石,由此引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当时,齐白石正在躺椅上养神。画送到手边,他便顺手接过。起初,他还是半躺着看,待看了两张画以后,他已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再继续看,齐老眼里放出亮光,身子也随着站了起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意呢!”齐白石晚年有个习惯,认画不认人。看完画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李可染身上,问:“你就是李可染?”李可染忙答应。齐老高兴了,赞许

道:“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没想到30年后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画。”徐青藤即徐渭,是明朝著名的花鸟、山水画家,其画以用笔豪放恣纵、潇洒飘逸而名重一时,对后世有极大影响。齐白石生平十分推崇徐渭,由此可见他对李可染的赏识。

接着,齐老满含深意地说:“但我看你的画像是写草书,我一辈子都想写草书,可我现在还在写正楷……”就这样,两人以画为桥,一下子变得十分亲近。李可染告辞时,齐老留他吃饭。齐可染再三推辞,齐老动了气,对正要迈出门槛的李可染大声说:“你走吧!”这时,齐老家人示意李可染:“你要听齐老的,

名流故事

一问一世界

杨 润

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采访她,正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亲切地说:“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这么叫我。”她先打开衣柜,让我帮她找一件合适季节的衣服。衣柜中不过十来年前的衣服,我们都看中了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找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纱巾,在脖子上围,问我是否好看。她有着极好的品位,这恐怕与她的出身教养有关。她生于官宦人家,是中国第一位原子物理专业的女性硕士毕业生。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思想“左”倾的她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翻译,1947年她最终决定放弃留学机会,奔赴延安。她后来嫁给了刘少奇并成为他已经有的5个孩子的母亲。

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

她始终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当时那么多普通的家庭因为政治原因夫妻划清界限,父子断绝关系,而她却在万人批斗会上从台下冲到台上拉着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感情?这之后12年的牢狱生活,每一天只能看到窗户缝里的阳光,根据阳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昼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之苦?正在我采访王光美之际,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来访。他先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听着,渐渐激动了起来,忍不住说:“光美对少奇,那真是无怨无悔啊!”继而泣不成声。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后,抱着他的头轻声说:“别激动,别激动,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够够。要不我给你拿一片药吃?”这一幕,让现场所有的人动容。

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经历了太多。出狱之后,看到了昔日丈夫的同事们是如何在判处他死刑的文件上签字。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仇恨与背叛,见识了这么多的

丑恶与黑暗,她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活过来?我问道:“当初你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教你的女儿唱打倒自己爸爸妈妈的歌曲。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王光美说:“我不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会遭受不少麻烦。为什么要让痛苦延续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问:“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没有想过在这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也有过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应声回答:“那真没准!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搞什么运动。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会冤枉不少人。”

王光美的母亲就是因为受到牵连,最后死在北京监狱里的。母亲曾被没收的首饰瓷器,在归还后都被王光美拍卖,并以筹集的资金设立了幸福工程,来帮助乡村的贫困母亲。母亲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已经失摆的老式座钟,那是母亲睡觉时摆在床几上的钟,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给它上弦,仿佛是一种与亲人的对话。

历史选择的人,人创造的历史,让我着迷。“记录一个人和他(她)的时代”,从那时起,成为《杨澜访谈录》明确的追求。

摘自《人物》

最后那些节目还都没播出。他只带了一个老助理,提着一瓶胖大海泡的茶,没有专车,在北京要自己打车,去外地就坐火车,和我们一样从北京站进出。如果见识过比他无名到不知多少倍的演员的排场,你就会讶异李安的好打发。以他的聪明,已经知道被人利用欺骗了,但还是很无奈地配合,连发飙都不敢。那些节目的编导都可怜他,说他有一双小动物般无辜的眼睛,但边可怜还是边把他按在那里,无休止地折腾。

看到那个场面,我会很信那本传记里的自述,他只有在拍电影时是那个小世界里的国王,他的气场才会吓坏章子怡。而离开了电影,他是个没有生活能力且无害的人,没有一般男人的攻击性,总是别人来侵略他。正因为如此,他比别的导演更纯粹,工作对他来说就是工作,不是孔雀的翎毛,为了求偶,为了炫耀,职业带来的虚名他也享受,但没有享受到那么夸张的程度,工作本身享受的快乐对他尤为重要,所以,有时候自由是自己争取的,不是审片委员会给予的。

摘自《新民周刊》

李安的自由

孟 静

陆川八面玲珑,很精明地选择《南京!南京!》。

很多导演的从艺之路不比演员,他们是喜爱光影才进入这个行业的,可走着走着,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唯唯不是为了电影去拍电影。李安未必比他们高明到哪里去,只是他确实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去讨好别人,他讨好的只是自己,但结果是,观众不傻,更接受这种真诚的讨好。

《卧虎藏龙》之前美国人会看一点功夫片,可功夫片和武侠片是两个门类,谁能想到他们会接受道家那套理论?《色·戒》里大段凶淫幽默的麻将戏,注定是在西方失败的,李安也没有因此把它舍弃。

几年前我见过李安一次,当时为了宣传别人给他写的传记,他被出版社忽悠到大陆,拉着转了几个城市,上了一些十三不靠的烂节目,

看金马奖颁奖礼上说起李安的新片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突然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几年前我看过这本书,非常奇妙的作品。一个少年和一只孟加拉虎,在海上共同漂流了227天,他没有被它吃掉,它也没有饿死,这本书包含的生存智慧是钢铁丛林中的人们闻所未闻的。

作为小说它有无限遐思的空间,拍成电影一定是最难的工程,动物、孩子、海,都是最不可控制的元素。没有明星,拍摄困难,注定这是块难啃的骨头。我所感动的是李安这些年来一直在拍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

不可否认,他是华人导演中拥有最大自由度的,其他导演不可能不考虑投资方,不考虑前途。张艺谋要挣钱,所以有了《三枪》;冯小刚为了拍大片,拍出个《集结号》;陈凯歌想忘记《无极》,转回到《梅兰芳》;